



瑞士当代文学译丛

百日

Hundert Tage

Lukas Bärfuss

卢卡斯·贝尔福斯 著 陈壮鹰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瑞士当代小说译丛

百 日

Hundert Tage

Lukas Bärfuss

卡斯·贝尔福斯 著 陈壮鹰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日/(瑞士)贝尔福斯(Bärfuss, L.)著;陈壮鹰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11

(瑞士当代小说译丛)

书名原文:Hundert Tage

ISBN 978-7-5327-5625-4

I. ①百… II. ①贝…②陈… III. ①长篇小说—瑞士—现代 IV. ①I52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07554号

Lukas Bärfuss

HUNDERT TAGE

Copyright © Wallstein Verlag, Göttingen 2008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得到瑞士文化基金会(Pro Helvetia)赞助

百日——瑞士当代小说译丛

[瑞]卢卡斯·贝尔福斯/著 陈壮鹰/译

责任编辑/裴胜利 装帧设计/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 插页 2 字数 114,000

2011年11月第1版 2011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6,000册

ISBN 978-7-5327-5625-4/I·3300

定价:24.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严重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021-57602918

总 序

今年春天上海世博会开幕期间以及在今后的几年里,瑞士文化基金会(Pro Helvetia)精选的瑞士当代优秀德语作家的文学作品将陆续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这个文化交流项目在瑞士文化基金会安·萨尔维斯贝格(A. Salvisberg)女士和柏林文学研究会(LCB)乌·雅内茨基(U. Janetzki)博士的倡导和支持下得以实施,中国读者将会在这个当代文学系列中充分感受今天瑞士德语文学中所蕴含的鲜活的文化记忆,体验当代欧洲社会生活的多棱面折射,感悟世界各地同时代人的情感和命运。

说到瑞士的德语文学,我们很快就会想起在苏黎世家喻户晓的高特弗里特·凯勒,想到他的《绿衣亨利》和《马丁·萨兰德》。凯勒在他的小说中,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向世界展现了位于阿尔卑斯山中心地带这个小小的国家,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历史画卷,描述了个体在社会形态变异中的历程。凯勒19世纪就已经为瑞士德语文学奠定了在整个德语文学中的重要

地位。

20 世纪的瑞士德语文学群星灿烂。他们中间不仅涌现出了像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施皮德勒、黑塞那样的经世作家,也蕴藏着像罗伯特·瓦尔泽那样鲜为人知、却又充满神秘和狡谀的现代主义文学家。著名的文学双子座迪伦马特和弗里施更是为瑞士德语文学增添了绚丽的色彩。这些作家在中国都有广泛的译介,深受中国的外国文学爱好者的喜爱。然而,我在这里使用的“瑞士德语文学”概念却蕴含着某种悖论,因为这个概念本身说明了瑞士德语文学在存在中的不存在,或者说是存在中的不存在。

我们若用罗伯特·瓦尔泽语调来说,假如有一种文学叫做瑞士德语文学,那么它就像这个国家一样,渺小得几乎就像片片飘逸的雪花,然而正是这片雪花所含有的巨大力量,染白了雄伟的阿尔卑斯山脉。对于任何一个瑞士人来说,地球面积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二都是国外,因此毫不奇怪,20 世纪以来的瑞士德语作家几乎都必须融入整个德语地区,或者融入整个世界。洛桑的文学理论家彼得·冯·马特曾经说过,瑞士德语文学是一种语言区域文化相互作用下的某种效应,瑞士籍的德语作家若要成功,那么他们必须要在其他德语国家得到认同,在那里摘取文学的桂冠。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仅有五百万德语人口的瑞士无法为德语文学的接受提供足够的疆土和阅读人口,如果说要对瑞士德语文学做一个定义的话,那么它首先是属于德语的,其次是属于德语国家的,再者是属于欧洲的,最后则是歌德意义上属于“世界文学”的,因此它也是属于瑞士的。之所以这么说,那是因为近当代瑞士德语作家的身份和存在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因此他们创作的视角、涉及

的主题以及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情感世界、生活和命运都远远地超越了瑞士的疆界。

过去如此,今天如此,将来也一定如此。

2008年初夏,我和宁波大学的陈巍,上海外国语大学的陈壮鹰、张帆,浙江大学的李张林等诸位同仁应瑞士文化基金会和柏林文学研究会的邀请,参加瑞士当代德语作家的译介和文学交流项目。2009年的初春时节,我与几位同仁去了苏黎世近郊小村,一个名叫“罗伦译者之家”(Übersetzerhaus Looren)的地方,目的是与几位当代瑞士颇有成就的中青年作家进行一次面对面的交流。那次我们还有幸与柏林文学研究会的雅内茨基博士一起专程去苏黎世拜访了瑞士著名的文学家、文学评论家、记者、国际社会活动家胡戈·罗切尔(Hugo Loetscher)。其实,罗切尔应该算是迪伦马特和弗里施那个时代的作家,或者说也是积极介入瑞士政治和社会活动的那一代瑞士知识精英,他的早期作品如《污水》(1963)、《编花圈的女工》(1964)、《大橙子里的秋天》(1982)等均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和讽刺特点。

那一年春天雪很大,罗切尔的手摔伤了,他的右手缠着石膏和绷带跟我们见了面,在苏黎世老城区给我们介绍了许多文学往事,他的步履有些缓慢,他告诉我们前几天走路不小心摔了一跤,手骨折了。那天晚上,他邀请我们在苏黎世城内的一家古罗马风格的饭店里一起用了晚餐。遗憾的是那次见面是我们最后一次聆听大师的教诲,就在那年8月,罗切尔不幸与世长辞。当时他正在阅读总结自己一生的自传《我的时代是我的时代》(2009)一书的样书,现在想来,这个不带问号的书名既是他对自己一生的自信,也是对

历史和未来的焦虑。他的去世无疑是德语文学界和瑞士知识界的一大损失。

我在与这位诙谐幽默、善言健谈的长者关于瑞士德语文学的交谈中,感受到他对世界的热爱,尤其是对中国的热爱,从20世纪80年代访问中国之后,他便不断地关注中国,多次访问中国,与中国的日耳曼学者和外国文学爱好者交流。我从他身上强烈地感受到了一种“世界情怀”,也许这是他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积极地活跃在拉丁美洲、东南亚等地,从事采访和写作而留下的“痕迹”,或许这种“痕迹”也代表了当代瑞士德语作家的某种共性。

然而,罗切尔是瑞士社会政治舞台上最后的勇猛斗士。今天的瑞士德语作家已经远离了迪伦马特和弗里施对瑞士本土的政治敏感和社会批判。他们关注更多的是人类今天和现在对历史的文化记忆,他们关注主体个人生活的本身,而且是一种超越瑞士疆域的跨文化生活本身,关注人类共通的主体间情感与交往经验,关注对日常琐碎生活程式的反思。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有托马斯·霍利曼(Thomas Hürlimann,《四十朵玫瑰》,2006)、克里斯蒂安·哈勒(Christian Haller,《好年代》,2006)、乌尔斯·费斯(Urs Faes,《爱情档案》,2007)、阿道夫·穆斯克(Adolf Muschg,《孩提婚礼》,2008)等。

2009年,伊尔玛·拉库萨(Ilma Rakusa)发表了小说《更多的海》,并且获得了当年的瑞士图书奖。这部小说采用了碎片和断章的方式回忆了作家在匈牙利和斯洛文尼亚的童年生活,随着家庭的迁徙,拉库萨的小说犹如茨冈人的大篷车,载着她的遭遇、记忆和情感走遍了欧洲各国,布达佩斯、卢布尔雅那、德里雅斯特、苏黎

世,以及她在巴黎、彼得格勒的学生生活。“我是一个永远漂流的孩子。”从这句话中我们看到了拉库萨默默眼神中流露出来的对陌生人的新奇和恐惧。

这种对个人经验的关注也表现在这套“瑞士当代小说译丛”所精选的作家作品中,比如彼得·施塔姆(Peter Stamm)。我是在瑞士“罗伦译者之家”认识施塔姆的,在译者与作者交流的那些日子里,我们常常在阿尔卑斯山的冽冽寒风中一起抽烟,因为“罗伦译者之家”是高科技环保建筑,所以我和他只能融入大自然了。他的口音似乎并不太瑞士,这大概是因为他曾在纽约、巴黎、柏林、伦敦等地居住多年,那些天我们谈了很多关于瑞士童话《海蒂》的话题,因为他自己曾改写了一部图文并茂的现代版《海蒂》读本,他对《海蒂》在中国拥有如此广泛的读者表示出惊讶。施塔姆第一部小说叫《阿格尼丝》(1998),次年这部小说就获得了奥地利萨尔茨堡劳利泽文学奖。2006年,他的小说《如此一天》问世,同样获得很大的成功,被先后译成五种文字。

《阿格尼丝》以美国为叙述地,用第一人称的视角叙述了“我”与美国女孩阿格尼丝之间发生的个人恩怨与情感。小说所关注的是写作与现实、文学意念与生活真实的双重性,以及个人情感与理性、责任的关系。作者以非常洗练的语言,独具一格的构思,使现实与虚幻随着主人公“我”的“小说创作”而交替变换,让主人公自私的灵魂不断接受着严酷现实的拷问。长篇小说《如此一天》是施塔姆的又一部重要作品。故事围绕客居巴黎的瑞士籍德语教师安德利亚斯与几位法国女人之间展开。作者再次娴熟地描写了爱的无力、主体的苍白以及个体对伟大感情炽热的渴望。

我和莫妮卡·施维特(Monique Schwitter)也是2009年初春在瑞士的“罗伦译者之家”相识的,当时她挺着大肚子,我很难想象她竟是著名的汉堡大剧院的话剧演员。我们一起谈论她的创作和作品,谈论她的《耳朵没有眼睑》。说施维特是瑞士人我开始几乎都不相信,因为她的口音显然是汉堡的,只有她在跟瑞士同乡说话的时候,她才说一口我完全听不懂的瑞士德语。施维特35岁的时候发表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假如在鳄鱼边上飘雪》(2005),就像她的演员职业一样,施维特的作品中具有强烈的角色戏剧性,她总是把叙述主体打扮成各种各样的人物,或者戴上各式各样的面具,采用各种叙述视角的转换,在文学这个世界大舞台上表现着日常生活的细节。我在阅读中常常想起罗伯特·瓦尔泽和他的小品文,毫不奇怪,她的《假如在鳄鱼边上飘雪》2006年获得了罗伯特·瓦尔泽文学奖。看来她喜欢在书名上做文字游戏,鳄鱼生活在不下雪的地方,这点是常识,假如鳄鱼见到了大雪,那么这条鳄鱼一定是在动物园里,一定是在桎梏之中。同样,她的长篇小说《耳朵没有眼睑》(2008)也是表达了叙述主体的生存桎梏,表达了叙述主体对生活真谛的探索和对个体自由和解放的渴望。小说采用侦探悬念的手法和元叙事方式,描绘了苏黎世普通人的众生相,表面的日常生活如爱情、同性恋和人际交往掩饰下的吸毒和凶杀。我们相约2010年在杭州再见,并带上她那当时还没有出生的孩子,她答应了。

记得和罗尔夫·拉佩特(Rolf Lappert)的第一次见面是在浙江大学的灵峰山庄,当时他受我之邀来给浙大德语专业学生讲学,朗诵他的小说片段《游泳回家》。那是2009年5月的一天,为了给他

接风,我去敲他的门,他穿着睡衣出来开门,长途跋涉给他留下了一脸疲倦。我在与他的交谈中得知,原来他和许多瑞士德语作家一样,也是一个世界公民。他曾经在巴黎生活多年,周游亚洲和加勒比海国家,2000年后在爱尔兰的港口小城利斯图威尔定居。拉佩特从20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文学创作,发表了小说《接下来的那些日子》(1982)、《路人》(1984)、《走失者之歌》(1995)和诗集《旅馆房间里的浪漫》、《泳者的视野》(1986),拉佩特的代表作是鸿篇巨制《游泳回家》(2008),这部小说2008年虽然进入了德国图书奖的最后竞争,但未能折桂,然而几周后,小说获得了同年瑞士图书奖。小说叙述了离开家园后的个体对精神故乡的向往,小说以幽默、冷峻的语言表达了当代瑞士德语作家的共同话题:寻找自我,在日常的生活话语中寻找自我。小说以少年维尔伯的成长过程为线索,以多种叙述视角和时空变换,表达了成长中的少年对自身的困扰和对世界的疑惑。

时隔一年后,也是在大雪纷飞的日子里,我和陈壮鹰、陈巍又一次来到了阿尔卑斯山上的“罗伦译者之家”。在那里我们又结识了两位青年瑞士德语作家,丹尼尔·戈奇(Daniel Goetsch)和卢卡斯·贝尔福斯(Lukas Bärfuss)。戈奇在我眼里是一个非常典雅的欧洲人,他在苏黎世长大,却来自我客居13年之久的德国首都柏林,鉴于我们俩共同的柏林情结,我显得有些激动,但他的谈吐似乎过于腼腆。我们围坐在“译者之家”面朝阿尔卑斯雪山的大客厅壁炉跟前,热烈地讨论着他的长篇小说《本·卡德》(2008)。客厅整面的落地窗外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他娓娓地给我们讲述着这部与他的家族历史相关的文化记忆小说。《本·卡德》反映了有着非

洲血统的卡德家父子两代法国人对伊斯兰文化的情结,小说通过两条时而平行,时而交叉的叙述路线,营造了凝聚在叙述主体身上的西方与东方、历史与现实、虚幻与真实二元相悖互动的现代主义文学叙述架构,表达了殖民、权力、种族、性别范畴内的文化话语冲突,以及作者对文化认同和自我认同的困扰和焦虑。戈奇的另一部小说是《沙心》(2009),写的是一个联合国观察员弗兰克在阿尔及利亚西撒哈拉沙漠难民营的经历,来自发达国家的男男女女与西撒哈拉难民、贫困、毒品、娼妓、黑市相遇,理想和希望在沙尘暴中遭到颠覆。东克尔的出现唤醒了弗兰克对美好爱情、对过去的生活记忆。理想只有从自身的经历中才能感知,这是弗兰克在记忆中获得的认知。

与戈奇不同,贝尔福斯却给人一种风风火火的感觉。他以一个艺术家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头发似乎特意有点乱,西服里面穿着色调极不般配的运动式翻领毛衣,一边的领子永远是翘起的,说话时苏黎世口音分外浓重,他那敦实的形象让人感觉与他的名字本意很符合——“熊爪”。他告诉我,他是图书商出身,读的是职业学校,成绩平平,后来有一天他觉得自己应该成为剧作家或者作家,于是就成了剧作家,写了小说。他觉得自己会成功,于是就成功了。他觉得他的艺术道路就是那么简单。贝尔福斯的代表作是《百日》(2008),这部小说使他一举夺得2009年瑞士席勒文学奖和2009年雷马克和平奖(特别奖)。《百日》也是一部非洲小说,据贝尔福斯告诉我,他曾经非常向往美丽的卢旺达,因为他儿时曾在课本中认识这个风景如画的非洲国家,后来他去了卢旺达,却被那里的政治动乱、贫困和腐败、民不聊生的景象所震惊。他的处女作

《百日》描述了瑞士援非人员大卫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的所见所闻,他与胡图部落女人阿佳忒的情爱以及他在1994年卢旺达胡图与图西种族大屠杀中的经历。美变成了恶,善行变成了兽行,女人成了疯狂的屠夫。小说在80万生灵涂炭的血河中反思、拷问、批评了西方彻底失败的援非政策,对西方价值观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下的权力话语机制,对因此而歪曲了的人类道德理性提出了质疑。

近年来,瑞士当代德语文学似乎显现出一种总的趋势。首先,文化记忆成为作家们所喜爱的创作主题,这个系列中所选择的作家几乎都在关注着集体和个体的文化记忆问题,他们的作品似乎都在与遗忘进行着抗争。他们所展现的文化记忆有些是历史政治事件的具体折射,有些则是个体在成长过程中的点滴经历。他们的作品几乎都远离了政治说教和宏大叙事,而常常用自己的身体去感知日常的生活细节,去反思主体的人生经验。其次,这些作家已经无意识地显示出罗切尔意义上的“世界情怀”,他们的作品写的往往是显微镜下的局部,或者甚至是细部,但是所放大的却是人类伦理的严肃问题,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因此也是严肃的。

是为序。

另:值此“瑞士当代小说译丛”出版之时,我谨代表译者向瑞士文化基金会、柏林文学研究会和上海译文出版社表示衷心的感谢。

浙江大学 范捷平

不能忘却的过去 (译本序)

在瑞士当代文学中,以政治事件或人物为题材的政治小说并不多见,能引起评论界关注和读者强烈反响的更属凤毛麟角,卢卡斯·贝尔福斯的《百日》却是这样一部近年来罕见的情节扣人心弦、视角独特、思想深邃的优秀政治小说。它自2010年出版以来,先后获得六项文学大奖,其中包括安娜·西格斯文学奖、席勒文学奖、雷马克和平奖等重要文学奖项,甚至一度被誉为政治小说回归的标志。

卢卡斯·贝尔福斯1971年出生于瑞士伯尔尼州图恩市。完成学业后从事过多项工作,如:烟农、钢筋捆扎工、花匠,后获聘书店店员,并完成书商职业培训。1997年后,他以自由作家身份开始工作生活,现居瑞士苏黎世。

贝尔福斯人生经历丰富,对社会具有敏锐洞察和批判力,其戏剧和小说往往对人性、社会、责任、良知进行深刻剖析,引起读者的广泛共鸣与反思。

他是近年来瑞士文坛最成功的戏剧家和小说家之一，是400asa剧团的创立者。其作品屡获文学大奖，并在世界各地公演。代表作有荒诞剧《迈恩伯格之死》（2000）、散文《死去的男人们》（2002）、戏剧《石油》（2009）、小说《百日》（2010）。《死去的男人们》带有一定自传色彩，描述一个图书商人厌倦生活、对人生意义产生怀疑。

小说《百日》虽然表面线索是一对青年男女在战乱中的情爱故事，但实际上讲述的是瑞士发展合作与人道援助总局在卢旺达种族屠杀中扮演的失败角色，更有甚者，作者用自己的笔毫不留情地鞭挞那些心高气傲、办事愚蠢的道德家在这场自奥斯威辛集中营以来最大规模的种族屠杀事件中犯下的罪责。

说起瑞士，人们首先想到旖旎的湖光山色、永久的中立政策、国泰民安、正直高尚等令人羡慕的美好印象，然而贝尔福斯在小说中却颠覆了这一形象。是的，瑞士总是忘我地帮助别人，国际红十字会总部、联合国总部均设在日内瓦，可瑞士真的像人们以为的那样美丽、纯洁、高尚吗？贝尔福斯在书中给出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正如小说中写道：不，我们不是制造血腥屠杀的人，是别人干的。我们只是沾了点血。我们懂得该如何独善其身，而不被鲜血淹没。对此我们很在行。

卢旺达被誉为非洲大陆上的瑞士，那里风光秀丽，人民友好、勤劳，经济欣欣向荣，贪污腐败情况较少，正在蹒跚地迈向民主政治。这就是贝尔福斯在中学地理课上学到的知识。220个形形色色的国际援助组织聚集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其中也包括瑞士发展合作与人道援助总局，而且后者与总统先生关系非常紧密。

1994年，这个一度令人感到文明开化得无聊的非洲天堂之国坠入地狱：胡图族在短短几星期内杀死了八十万图西族人。

时至今日，人们对这场20世纪末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做了足够的研究，许多电影和小说以此为题材，对这场灾难的根源以及人性的善良与暴虐、坚强与软弱进行了多方面刻画，如电影《卢旺达饭店》、小说《基加利游泳池边的一个星期天》、《乐观者们》。社会学家们断言，这场屠杀不是由普通的族裔间冲突、世代血仇和无政府混乱引起的，而是一场精心策划、手段非常现代化的种族灭绝行动。

贝尔福斯对上述结论心知肚明，但他在小说里对其进行了更进一步、更深刻、更无情的揭露：西方媒体眼中黑非洲大陆上演的残酷一幕，其实与以瑞士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和政府的倾心培养、大力援助密不可分。卢旺达是我们的好学生，谦虚好学，认真上进。正是我们这些满怀高尚理想的瑞士好人为大屠杀提供了完善的基础设施：道路、电信、电台，培训煽动屠杀的记者，教给当地官员缜密规划、认真执行的本领，低估总统先生对大屠杀的参与程度，对悲剧视而不见，甚至否认。这种我们的美德与他们的罪行之间的共生现象，令小说主人公——瑞士发展合作与人道援助总局雇员戴维·霍尔精神濒临崩溃：因为我想公正，结果我犯了罪，而当我犯了罪，却心里感觉公正。

贝尔福斯笔下呈现的画卷是黑色而沉重的，但作家不是虚构杜撰，而仅仅是在描绘。他在小说中尖锐地批判国际援助机构的高傲、盲目和愚蠢，甚至有些毫不留情，但并不为过。真相不像白

纸黑字那样简单明了,没人能给出解决悲剧的良方,就连作家也不例外,但我们能够、也应该细细回顾和审视这一段悲惨历史,并对之深思。

贝尔福斯为撰写这部小说,整整花了两年时间做调查研究,询问证人,阅读文件,实地探访。小说涉猎知识广泛,不仅有政治、矿业、豆类种植,更有令人揪心的事实数据。他成功地将诸多调查结果演化成小说血肉,将自己对政治和道德的怀疑转化成小说中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以及令人深受启迪的动物寓言。贝尔福斯没有直接描述大屠杀的残忍,而是采用间接手法,但读者依然能感受到遍地的淋淋鲜血和残破肢体,以及主人公内心的迷惘与痛苦。

小说描述的是非洲历史中黑暗的一页,许多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其中。人们往往满怀崇高理想,却最终发现达到的效果与自己期盼的截然相反。小说主人公戴维·霍尔即是一个典型代表。小说的引人之处不仅仅在于战乱中的情爱,更重要的是它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种族大屠杀发生背后的深刻原因,引发读者对国际社会、世界各国政府组织在这场人道灾难中应负责任的反思。

1994年4月,全体白人撤离卢旺达首都基加利,戴维却留了下来,这是一种完全疯狂的举动,既带有孩子般的勇气,又带有对爱情的狂热追求。他躲在别墅中,依靠胡图族花匠获取食物和有关他心上人胡图族姑娘阿佳忒的信息。花匠通过谋杀和抢掠得来食物及生活用品接济戴维,虽然戴维内心从道义上谴责这种行为,但

为了生存,他选择当睁眼瞎。当他发现花匠杀死替他打扫房间的女仆,仅仅是为了得到她的自行车时,戴维愤怒了,于是他便默默地看着一群打家劫舍、喝得烂醉的娃娃兵带走并杀死了花匠,在那一刻,他心中得到了些许平衡,他用罪恶洗刷了罪恶。戴维根据花匠死前留下的信息,追随胡图族难民来到刚果边境的难民营,在那里他找到了朝思暮想的恋人——阿佳忒,一个在欧洲比利时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胡图族高官的女儿。阿佳忒从最初举止优雅的多情少女,蜕变成一个满脑子充满偏见和狂热妄想的种族分子,她不仅为屠杀辩解,而且也成为屠杀的煽动者和组织者。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少女身上发生的蜕变,却激起戴维对她的深深迷恋。阿佳忒变得越陌生,戴维就越对她的放荡和无耻感到着迷。

就这样,戴维渐渐偏离瑞士发展合作与人道援助总局设定的正确轨道:他抛开代表处主任、母亲般对待下属的玛丽安娜、抛开因发生了大屠杀而悲观失望的副主任、矿石爱好者保罗,投入玩世不恭、放浪形骸的米斯兰德,一个欧洲殖民主义者的替罪羊的怀抱。

瑞士援助人员被称作“联络员”,他们满怀工作热情、头脑清醒理智、任劳任怨。他们说一口纯正的法语,那是代表理智的语言。他们每天下午五点准时离开办公室,对当地人在下班后用班图语说些什么不感兴趣,对当地人暗地里干些什么也不感兴趣。他们是一群遵守纪律、办事认真负责的人,并且一心想把这种美德同样传授给当地人。他们热衷于跨文化交流。贝尔福斯的深邃目光一直透入卢旺达黑暗的心脏,不会有人喜欢他揭露的事实真相及背后的思考,而这恰恰令《百日》这部精彩的政治小说变得扣人心弦,